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

巾帼春秋



中国妇女出版社

巾 帼 春 秋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巾 帼 春 秋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委印刷厂印刷

850×11168 毫米 32 开 10.625 印张 270 千字

1988 年 8 月第一版 1988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80016-087-4/K·4 定价:2.70 元

目 录

前 言	(1)
茫茫黑夜里的航标	
——记北京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	苏 平(3)
北京妇女运动的排头兵	
——记五四时期的北京女高师	郎文毅(11)
五四前后北京的女权运动	季 华(19)
李超之死	袁立明(26)
不成功的尝试	
——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	燕 秀(30)
大学开放女禁	沈 伊(33)
在国民革命的浪潮中	文 怡(37)
女师大风潮	刘宁元(44)
战歌悲壮	
——记“三·一八”运动中的妇女	丁 鹏(52)
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妇女	李沧明(62)
心系长城	石小玲(73)
一道停职令激起的风波	毛 岩(83)
活跃在艺术与斗争的舞台上	
——记北平剧联的女战士	谢荫明(90)
北平妇女力争法律平等	向 宁(96)
“妇女回家去”的论战在北平	刘 坚 丛 文(102)
“一二·九”的浪花	张仲璧 金 陵(110)
北平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	陈心濂(126)
援绥抗战之歌	南宫生(134)
她们,在苦难中站起来	钟德钧(145)

目 录

前 言.....	(1)
茫茫黑夜里的航标	
——记北京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	苏 平(3)
北京妇女运动的排头兵	
——记五四时期的北京女高师.....	郎文毅(11)
五四前后北京的女权运动.....	季 华(19)
李超之死.....	袁立明(26)
不成功的尝试	
——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	燕 秀(30)
大学开放女禁.....	沈 伊(33)
在国民革命的浪潮中.....	文 怡(37)
女师大风潮.....	刘宁元(44)
战歌悲壮	
——记“三·一八”运动中的妇女.....	丁 鹏(52)
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妇女.....	李沧明(62)
心系长城.....	石小玲(73)
一道停职令激起的风波.....	毛 岩(83)
活跃在艺术与斗争的舞台上	
——记北平剧联的女战士.....	谢荫明(90)
北平妇女力争法律平等.....	向 宁(96)
“妇女回家去”的论战在北平.....	刘 坚 丛 文(102)
“一二·九”的浪花.....	张仲璧 金 陵(110)
北平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	陈心濂(126)
援绥抗战之歌.....	南宫生(134)
她们,在苦难中站起来.....	钟德钧(145)

前 言

1919——1949年，整整30个春秋。在无垠的历史长河中，它是短暂的。然而，却是崭新的一页，也使数千年沉沦于苦海的妇女获得新生。30年间，北京（北平）妇女的热血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流淌着，奔涌着，汇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伟大的革命洪流之中。在这里，我们仍可以清晰地听到她们发自肺腑的呐喊，仍可看见刀光剑影中她们不屈的身影，仍可寻觅崎岖坎坷的道路上她们留下的一行行脚印……

狂飚突进的五四运动，开始了妇女解放史的新纪元。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下，北京女学生奋勇当先，冲破封建樊篱，争民族解放，争妇女参政权、职业权、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发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无责”的呼号。它似一声春雷，震撼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

大革命时期。北京妇女不畏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强权统治，伸张公理，保全人权，投入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女师大的风潮中，三一八的枪声里，她们用鲜血和生命表明：中国女子也一样奋发，一样勇敢。她们不再是文明的点缀品，而是革命者、是猛士。

九一八事变。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北平妇女为争取民族与妇女自身的解放，成立妇女组织，兴办妇女刊物。奋起救国。无论是街头募捐，还是前线慰问，无论是动人心弦的赴南京请愿，还是举世震惊的一二九运动，都留下她们的足迹，都倾注了她们的殷殷爱国之情。

七七事变。北平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北平妇女坚持艰苦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根据地斗争，与敌人进行巧妙的周旋和搏斗。其中既有受命于危难的地下共产党员，又有在敌人屠刀面前大义凛然的女中豪杰，既有帮助地下党工作的上层妇女，又有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妇女。她们如同茫茫黑夜中闪烁的群星，放射出动人的光辉。可歌可泣的爱国热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为后人称颂。

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妇女与男子并肩争和平、反内战。在工运、学运、罢工、罢课的队伍里都有妇女参加。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女地下党员们为传播革命火种，发展、扩大革命力量做出贡献。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也留下北平妇女奔走和平的匆匆脚步和强烈的疾呼声。

本书记载的篇章，仅仅是北京妇女运动中一个个真实、难忘的片断、镜头。愿读者以一斑窥全豹，更多地了解北京的现代史，北京的妇运史。

让这些篇章永远载入妇女运动史册吧！

在此，对给予此书热情支持、帮助的老同志及史学界、新闻出版界有关方面和热心人士，谨表深切谢意！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1987年12月

茫茫黑夜里的航标

——记北京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

北京妇女有一部光辉的解放斗争史。

回顾这部历史，不能忘记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为妇女解放所做的重要贡献。他们中在北京的突出代表是李大钊、高君宇，还有早年的陈独秀。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北京党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高君宇是北京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五四”时期北京爱国学生的领袖。1919年的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旗帜，举行了反帝爱国的游行示威，他和许德珩等学生会干事，率领示威同学冲进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点燃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火炬。之后，高君宇在李大钊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曾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担任过共产党的总书记。大革命后期，堕落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年，他们在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都撰写不少文章，论述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

旧中国，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男子普遍是受三种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女子却受四种权力的压迫，除上述三种权力外，还要加上一个“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全部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如四条绳索紧紧地束缚着妇女的身心，再加上维系这些权力的封建伦理道德，诸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女诫”、“七出”、“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就全面剥夺了妇女做人的权利，侵犯了妇女的独立人格，决定了妇女从生到死，都残喘在卑贱与从属的地位和任人买卖、歧视、污辱、摧残的悲惨命

运。

随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勃起，中国妇女也曾为挣脱枷锁，求自身解放做过奋斗，例如：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运动的先驱秋瑾，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还被推选为浙江省的主盟人，还组织女子军，英勇地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同时，她又兴办女学，创办《中国女报》，积极宣传男女平等的主张。确实大长了女子的志气。秋瑾牺牲后，于1912年又有唐群英、张汉英、林宗素等发起的女子参政运动。很多地方都有妇女组织出现。为争取女子参政权，唐群英等20多名女青年，曾经大闹南京临时参议院，踢倒卫兵，打碎门窗玻璃，直闹得孙中山出面调解。也确实壮了妇女的雄威。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它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也不可能领导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所以，尽管当时妇女已开始了初步的觉醒和奋斗，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妇女运动也告夭折。

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是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帝专制制度。但是，代之而起的却是封建军阀专制。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不但原封未动地承袭了全部歧视、压迫妇女的封建制度和传统，而且为实现他们复辟帝制的梦想，压制民主革命力量的发展，还抬出孔子的灵牌，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北洋政府在《天坛宪法》上公然规定国民教育“要以孔子为修身之大本”。从而给儒家的封建教条穿上了严森的法律外衣，迫令人们去遵守去服从。当然，受害最重的还是妇女。

1915年，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等，在文化界、思想界、青年学生中，发动了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传统观念为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把女权和人权并列，陈独秀在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很多文章，提倡男女平等，批判“儒者三纲之说”，主张女子在政治上“不必同于夫”，在经济上应当“独立自营生活”，在社交上应当自由交际，婚姻理当自由。他还鼓励男女青年“摆脱奴隶之羁绊”，“以恢复独立之人格”。陈独秀当时的妇女

观,虽然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范畴,他的主张也还没有触及妇女问题的实质。但,他对压迫妇女的封建传统敢于迎面痛击,不仅对妇女是很好的启示,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对妇女问题的广泛探讨。当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也随之转变和深化。1921年陈独秀在一篇题为“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就鲜明地指出“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他说:“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而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在社会公共劳动”,“工人资本家没有分别,大家都要作工”;这样,女子“在家庭不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受男子压迫”,就能够达到“女子在家庭,固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也有独立的人格”。所以解决妇女问题,“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他号召“男女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男女实行联合弱者”共同为改造当时的社会制度而奋斗。

李大钊是1916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很快就投身新文化运动,并成为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撰写许多文章反对封建军阀专制,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道德、旧礼教,痛斥那些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示。他自觉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1918年,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任经济学教授时起,就积极参加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辑部工作。一面研究问题、写文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对妇女问题也更加关注。从这时开始,到他1927年英勇就义前,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民主》、《现代的女权运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废娼问题》等文章,针对妇女当时的处境和社会上各种妇女运动思潮,对妇女问题,做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论述。

一,李大钊第一个把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展示在人们面前。他指出:“一个社会里,如果把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不但

“断没有民主的精神可言”，而且是患了“半身不遂”之症。当时的中国，正是李大钊指出的那种“半身不遂”社会。那时，新文化运动已经搞了四五年，妇女仍被排斥在社会活动之外。譬如：“五四”前夕，北京大学也曾派学生代表前去联络，希望男女同学能一致行动。女高师校方却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教条，把男女学生代表，分别安排在大礼堂的两个对角，中间设女学监来回传话，一问一答，双方思想无法自由沟通，秘密联络受阻，致使女学生没能参加五四当天的游行活动。堂堂女大学生的人格尚遭如此侮辱，普通妇女的人格人权更谈何保证。李大钊愤怒指出：“人民”这个名词，是包含男女两性在内的。“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全体的民权民主政治”。“没有妇女的民主，断不是真正的民主”，他向男女青年指出：“我们若要求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先做妇女解放运动”。在李大钊的指引下，北京的女学生，不顾重重阻拦，冲出校门，走向社会，投入“五四”反帝爱国斗争中去，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也获得一定规模的发展。

二，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五四”时期，社会上各种妇女运动思潮，对妇女受压迫的原因，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妇女受压迫，就是因为经济不独立，经济不独立，又是因为没有受教育和没有职业；有的认为妇女受压迫是因为妇女不能参政，只由男人们决定一切，不能代表妇女利益；有的还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笼统地归罪于男子，认定“社会一切恶制度，都是不肖男子造成的”。

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他说：二千余年来，压迫妇女的封建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都是以封建社会的经济私有制度为基础的。他还说：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那么长久，并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是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适应了我国两千多年未曾变动的封建的私有制经济。所以，一旦封建的私有制经济发生变动，孔门的纲常伦理也就都将随之崩坏。李大钊还系统地阐述了妇女从原始社会最受尊重的地位，逐渐降到从属于男子的

历史过程,说明妇女地位的变化,正是由于私有制经济和剥削阶级的产生所造成的。这样,他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同时,他也向人们指出:“只有经济上发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才能趋于平等的境界”这就是说,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推翻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

三,李大钊对封建的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说,中国的封建家族制度,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封建专制制度,是封建家族制度的放大体。而孔门的伦理道德,则是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共同的精神支柱。它们相互依存,构成吞噬妇女个性、人格的恶魔。李大钊说:“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词,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在封建家族制度下,于父子关系中,女子做为母亲的那一半又被剥夺掉,要求女子道德重“三从”(从父、从夫、从子),“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于是,女子的人格、个性全被侵却,因此,他指出:以孔门伦理道德为精神支柱的封建家族制度,是剥夺人的权利、自由,禁锢人的个性的牢笼。他说:今日社会上种种解放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运动。他预言随着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封建家族制度必将走向彻底崩溃。

四,李大钊对当时风行的公娼制度深恶痛绝,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在《废娼问题》一文中指出:“到了今日,人类社会上还有娼妓存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认许公娼,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他对当时社会硬把好端的一个人,“放在娼门里,让她们冒种种耻辱,在青天白日之下,去营那人间卑贱的生活,出卖自己的肉体、精神、完全人格”的罪恶行径,看做是人类的奇耻大辱。号召大家“对于这种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制度风俗,都应认作仇敌,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攻讨他,征伐他,非至扑灭他不可。他认为,为了尊重人道,为了尊重恋爱生活,为了尊重公共卫生,为

了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为了维持妇女尊严，都不可不废娼。因此，他要求：“中国主持正义的男子和自觉的妇女联合起来，发起一个大的运动，不令社会上再有娼妓、妾婢这等名辞存在，不令社会上再有人作娼、作妾、作婢的妇女，不令社会上再有拿人作娼、作妾、作婢的男子。”他认为当时的废娼运动，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要想真正从根本上废除娼妓制度，就必须把这个罪恶的“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就不能生活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

五、李大钊对女权运动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和科学的批判。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在辛亥革命以后，曾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主要形态。李大钊充分肯定了中国女权运动在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等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称许女权运动之兴起，是妇女寻觅自己时代的曙光。他说对这种运动“名之曰‘革命’，并不过分”。他还认定女权运动与后起的劳动妇女的运动“有互相辅助的必要”。因此，他热情支持女权运动者反抗封建束缚和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关心她们所提出的妇女教育、职业和参政问题。但，同时，李大钊也明确指出女权运动是带有阶级性的。他综合欧美各国女权运动提出的主要要求，得出结论说：“各国的女权运动，都是源于中流阶级的妇女”，代表中流阶级妇女利益，反映中流阶级妇女意志的。“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他指出：“女权运动者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妇女天高地阔，只有一身，她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一个是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所以他说女权运动同劳动妇女运动又纯是两码事。广大妇女的问题，如果单靠着女权运动去解决是不可能的。他举例说：“假定有一无产阶级的妇人，因为卖淫被拘于法庭，只是捉她的是女警官，讯她的是女审判官，为她辩护的是女律师，这个妇人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当然不能，因为有一个强制妇人不得不卖淫的社会组织在那里存在。难道在那个罪恶的社会组织机构中，安排一两个女人，就能算全体妇人的利益吗？当然也不能。据此，李大钊指出：“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反之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

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在“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他号召做女权运动的中产阶级妇女,自觉地去“辅助劳工妇女的运动”。

六,李大钊高度评价新兴的中国劳动妇女解放运动,为她们指出了彻底解放的正确途径。20年代初,中国劳动妇女以勇敢战斗的精神,登上历史舞台,立即显示出这是一支组织能战斗的劳动大军,这支劳动妇女大军,不仅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的前卫。李大钊满怀信心的认定劳工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因为她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是使她们贫困的唯一原因,知道法律是阶级的法律,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所以她们能够义无反顾地去摧毁这一切羁绊而奋斗到底。他号召劳动妇女为达到彻底解放的目的“一方面要合妇人整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他预言:“2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解放的时代,亦是妇女的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的意义的时代”。鼓励全体妇女起来奋斗,改造“半身不遂”的旧社会,创造新世纪的世界文明。

李大钊的这些重要的论述,从理论上指明了妇女彻底解放运动的方向、道路,也解决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方法和政策问题。

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始终把妇女解放运动当作整个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导,热情研究。1922年11月,他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女权运动者应当知道的》,集中表达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

他尖锐指出,当时女权运动者所发出的要求妇女参政的呼声,是“少数特权阶级妇女与官僚议员争座位的活动,不能够成功一种群众的运动,与妇女解放四字丝毫不发生关联”。如果女权运动者不能把自己的活动立基在大多数妇女的实际需要上,那么她们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新女性运动’。不可能把妇女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高君宇还针对女权运动者把大多数劳动妇女排斥在一边,只有少数上层妇女在一起开会、打电报、上书请愿的冷清局面,告诫说:“现在

女权运动的女同胞们，如果运动的目的是在解放妇女附属地位”，就不要把女权运动“做成太太小姐的运动，要做一切劳苦妇女政治经济和教育利益的奋斗”。女权运动如果“不为了劳动妇女地位的奋斗，妇女解放也不能有望。”

高君宇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指出女权运动者应当知道妇女所处的附属地位，“是封建制度和私产社会的自然结果；惟有到了打倒私产制度，建立一个共产社会的时候，他们的完全解放才能成功”。抛开这个根本问题去谈什么男女平等，争什么参政权，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地位。所以“女权运动惟有与工人运动并着前进，才能做到真正的解放”。

李大钊、高君宇和早年陈独秀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象在茫茫黑夜中的航标，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正确的航线。北京妇女从“五四”起，特别是建党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按着这条航线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妇女骨干，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女英雄，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故事，这一切，将永远在人们的心里，闪耀灿烂的光芒。

（苏 平）

北京妇女运动的排头兵

——记五四时期的北京女高师

在五四风暴中，有一个活跃的妇女群体，它在全市女学生中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这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这个学校的进步女学生，率先冲破封建罗网，投入爱国运动，成为北京妇女运动的排头兵。

陈老师课堂传时事 众女生愤起冲罗网

当时北京只有十几所女子中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要算女子最高学府了，开始有不少学生为逃出封建家庭，进入高等学校而感到喜悦。但入校不久，就“总觉得石驸马大街红楼（指学校的红楼）不象理想那么美丽。”该校教育方针是培养贤妻良母，遵崇孔孟之道，校内是“门禁森严的看守；校长严厉的监督；学监日夜的检查；礼记内则的讲授；桐城古文的习作，一切的一切都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度反感和无限苦闷”（程俊英、罗静轩回忆）。这座女校名为高等学府，实为以旧礼教习俗、伦理道德戕害知识妇女的高级封建堡垒。

强大的五四风暴，势如破竹。在“爱国不分男女”的口号下，温顺善良的女青年也开始奋起争自由，争民主，争民族解放，争妇女解放了。

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虽有北大学生代表来校联络，但由于校长和学监的阻挠，女生未能参加当天的游行。可到了晚上同学们听到外校男同学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以及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有一部分同学当即跑到新华门前要求和男同学一起坐牢。

第二天早上陈中凡老师来上国文课，他没有讲课，却站在讲台上严肃的对同学们讲述了头天发生的事，他从日本帝国主义者巴黎和会

上如何蛮横无理的要求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说起，讲到北京各大学的爱国学生如何愤怒，组织游行抗议，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如何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并无理地逮捕爱国学生等情况，陈老师讲得严肃、沉痛，学生们听得义愤填膺，大家气得你一句，我一句的大骂卖国贼，课堂上燃起了炽烈的反帝怒火。学生们再也没心思关在教室里埋头读书了，大家自发地列队准备上街游行，校长方还顿时慌了手脚，在他看来女生上街游行简直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女高师素来对学生要求苛刻，平时不准出大门，不许见男客，家在北京的学生每星期六回家一定要有家长盖过章的通知簿。家不在北京的学生，星期天外出探亲访友，必须得到学监的批准，才能出校，并限于下午五时前返校，否则，下星期天不得外出。现在学生居然列队要出去游行，这还了得。于是校长和学监们便使尽全身的解数，将北洋军阀政府严禁学生闹事的命令奉为圣旨，对学生又是威胁，又是劝说。但是，已经开始觉醒的女高师同学，任凭校方百般阻挠，还是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无责”的誓言，毅然冲破女高师的封建罗网，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投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

各女校联合行动 关应麟断指血书

过了两天，北大学生会派代表来到女高师，要会见同学，报告掀起这场运动的经过，并说：日本侵略中国，卖国政府不抵抗，学生不出来干涉，亡国就在眼前，我们就是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同时告诉同学们要成立一个北京学生联合会，邀请女高师也派代表参加筹备，当即就有部分同学推派陶玄和王世瑛两位同学为女高师代表，她俩人向来访者表示爱国人人有责，保证立即召开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当晚全体同学齐集大礼堂开会，由陶、王二同学主持，并传达了北大同学代表来校汇报情况以及所提要求。会场上群情振奋，与会同学一致主张参加组织北京学生联合会，并正式推举了出席代表，紧接着就通过了成立学生自治会。

这次会开得很热烈，站在窗外窃听的几位学监听到同学们是推代表参加男学生的组织，又是成立自治会，吓得神不附体，急忙跑到校长